

# 先理解，後批評： 回應姜義華

● 劉述先

## 混淆與誤解

姜義華先生在《二十世紀儒學在中國的重構》一文中，注意到當代儒學的重構曾經先後形成五個高潮，認為這種重構是企圖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精神與物質、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銜接點的一種嘗試，自有其歷史的合理性。這樣的說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內容方面，他有些過分概括與不很精確的地方。譬如頁29（《二十一世紀》創刊號，下同），他說：「50年代末及60年代，以儒學的重構為己任的是生活於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方東美等。他們的主旨集中表現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1958年聯合發表的……宣言中。」事實上這篇宣言雖有相當代表性，但錢穆拒絕在宣言上簽字，方東美對於心性之學有十分不同的見解，不可以這樣混在一起講。又頁30，他說：「馮友蘭之於邏輯實證主義，……關係之密切世所周知。」事實上與馮友蘭關係密切的是新實在論，邏輯實證主義根本排斥形

上學的建構，與他並沒有很深的關係。而姜先生批評儒學的重構在現代文化建設上恐怕是進入了誤區，則顯示他對於當代新儒家的思想缺乏相應的理解。簡單說來，他批評當代新儒家對儒學的歷史和儒學在現實生活中的實際作用採取理想化態度，多了一些浪漫主義的情懷：他將儒學定性為一種努力保障傳統的小農文明有序而穩定地不斷再生的觀念體系，當代新儒家的說法會阻撓或扭曲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進程；最後他反對將新型文化的創造拘束於儒學的範圍之內，並指出所有這一切與其說是理論問題、學說問題，不如說是現實問題、社會實踐問題。他是站在生活實際的立場批評學者們在書齋中和講堂上的高談闊論。

## 分疏與再詮釋的必要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姜先生的批評在觀念上缺乏必要的分疏。有些說法是不可以一概而論的。一部分新儒

家學者可能在某一時期把過去浪漫理想化，但這並不證明所有新儒家的學者在所有的時期都把過去浪漫理想化。舉例來說明，如所周知，徐復觀先生對於傳統專制的毒害有極其辛辣的批評與鞭辟入裏的反省，牟宗三先生著《才性與玄理》，指出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幾乎無一善終。姜先生似乎也不明白，建立超越的終極關懷與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把歷史與現實加以曲解或浪漫理想化，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在這些地方缺少必要的分疏，就不可能了解當代新儒家思想的精義。

其次，姜先生把儒學定性為小農文明的觀念體系，這是套用大陸流行的思想框架，正是當代新儒家所要反對的東西。當代新儒家要劃分開儒學之內受到時代環境因素限制的成分與萬古常新、可以重新詮釋賦予現代意義的成分。如果一個時代產生的思想的意義只能夠限於那一個時代的話，哪還有甚麼儒學在現代重構的問題呢？譬如馬列是十九世紀的產物，難道它只對十九世紀的人有意義嗎？或者它只能成爲一種僵固的意識形態——它的重要信息不能夠重加詮釋，與時推移，那就只有被埋葬的命運，決沒有甚麼未來前途可言了。如果當代新儒家批評現代西方的偏失，考慮到後現代的問題，就會妨害到現代化的進行，難道說我們的思想竟無須瞻前顧後，作出自己的選擇，只容許追隨一種觀點，義無反顧地「實踐」，這樣就會達到現代化的效果嗎？姜先生所預設的是一種虛假的二分法，把問題過分簡單化了。

## 傳統與現代的關係

事實上傳統與現代是一對複雜的觀念，彼此間有雙向的互動的作用，不可以固着化成爲對立的兩極看待。最近日本作家井上靖以生動活潑的筆調寫了一本《孔子》，不旋踵就賣出了幾十萬冊，在日本造成了「孔子熱」的現象。對此我們要作怎樣的解釋呢？或曰這是因爲當前日本的社會過分商業化，缺少精神的慰藉，於是需要孔子給他們提供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這種解釋正是強調孔子思想中對現代的批判力量。但日本的大商家經常請岡田·武彥一類的儒者爲他們演講，而日本經濟之所以成功乃至凌越西方的成就，有許多學者歸功於儒家倫理以及文化的因素，那麼儒家思想與現代化也可以建立某一種的關聯，值得我們作進一層的省思與研究。當代新儒家正是要找出儒家思想之內可以與現代化結合的成分，但在同時也要對現代文化採取批判的態度，這兩件工作儘可以同時進行，並行不悖。這樣做的時候，我們並不需要把儒家的歷史與現實理想化。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徹底檢討其負面的積澱的因素，但也無需自貶，對於自己的傳統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而儘可以從裏面汲取有用的資源。爲甚麼孔子到了外國就變成有現代乃至超現代意義的東西，在中國卻變成阻撓現代化進行的象徵呢？而最弔詭的是，台灣並不反孔，現在乃成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大陸1949年之後，反孔反得最徹底，現在卻成爲最落後的地區，這樣的現象是否值得我們好好省思呢？大陸學者終究必須面對一個根本的問題：傳統必須被扭曲到怎樣一個程度，它要與怎

樣的因素結合在一起，才會造成阻撓現代化的效果。

## 理一分殊

至於當代新儒家思想會不會拘束新型文化的創造呢？如果把儒學當作僵固的意識形態看待，當然就會產生禁錮的不良後果。但當代新儒家了解儒學的根本精神在於肯定每一個人生命的生生的仁心，強調隨感隨應，與時推移，怎麼會產生拘束的作用呢？王船山就曾說過「不以理限事」。近來我重新解釋和改造宋儒「理一分殊」的觀念，斷定理一是超越的規約原則，分殊的具體表現包括孔孟在內則必須受到特定的時空條件的限制而不能隨意加以普遍化。故我們必須以現代批評傳統，才可以避免傳統僵固所造成的禍害。但反過來，我們是否必定要倡導相對主義，才能有新型文化的創造呢？恰正相反，由現代到後現代，根本的問題是價值完全失去定準，試問否定生生，違背仁心，新型文化創造究竟要往哪一個方向走呢？現代文明有許多創穫，但也在許多方面造成嚴重破壞乃至非人性化的效果。故必須以傳統批評現代，才能喚醒大家，不要讓人類文明的發展走上毀滅的道路。當代新儒家決不是要走向回頭路，更不是要拘束科學的發展，而正是要順着科學內部發展的要求去宣揚生態學、環保，乃至重新肯定天人合一的理念。

儒學理念的拓展與現代精神相呼應，它並不代替科學研究，但它確定要積極參與由新科技引生出來的問題如試管嬰兒、安樂死等等的討論而作出存在的抉擇。海外的新儒家是預設

了一個多元的架構對於現代與後現代的問題作出反思，說出自己所以贊成或者反對某些東西的理據。在一個民主自由的體制之下，學者在野的努力，根本不存在拘束不拘束文化創造的問題。

## 結語

最後我覺得姜文的根本癥結問題正在於姜先生那種只求實效不重理論的態度。1988年新加坡開儒學會議我就發覺海外與大陸學者的態度有很大的差距。當時我曾作過一些觀察，到現在還完全適用，正好作為對於姜文的回應<sup>①</sup>：

海外對儒學的研究的確和當下的實效隔了一個層次；決不能說有利的就刻意提倡，不利的就橫加污蔑。做思想史的目的是還出歷史的真相，而做哲學的目的是作理論的建構。這些表面上都是不急之務，不能與眼前的急效拉上關係，但對一件史實的了解與對一個概念的分析搞得清楚之後却會有長遠的影響。

現在東亞哲學研究所做研究的大陸學者金春峰訪問我時，我就指出了一個十分弔詭的現象：比較激進的大陸學者主張全面對外開放，乃至有接近全盤西化的想法，却不知道他們之事事求急效正表現了十分非西方的特色——西方有一個長遠的理論獨立自主的傳統，決不容許為了一時的利害把史實或概念隨意歪曲過來講。海外的學者並不是不了解國內的苦衷，但有一些分際却必須維持住，否則往往欲速則不達，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反過來覆過去，搞了幾十年還在原地踏步，這真是歷史的最大的諷刺。

以上有關姜先生對二十世紀儒學的重構的討論正可以作如是觀。我若有說錯的地方，很希望能夠得到姜先生的指正。

### 註釋

① 見劉述先：《大陸與海外——傳統的反省與轉化》，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頁131。

**劉述先** 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於上海。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獲台大哲學研究所碩士和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曾先後出任東海大學、南伊利諾大學教授，自1974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系主任，1981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劉教授治學以宋明的儒學為主，著述豐富，包括《新時代哲學的信念與方法》、《生命情調的抉擇》、《中國哲學與現代化》、《朱子哲學思想發展與完成》、《文化與哲學的探索》、《黃宗羲心學的定位》、《中西哲學論文集》和《大陸與海外》等書。

